

● 中国文学

新型意识形态的建构

*——新英雄传奇主题话语之二

吴道毅

(中南民族大学 文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4)

[作者简介] 吴道毅(1965-), 男, 湖北来凤人, 中南民族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文学博士, 主要从事中国当代小说研究。

[摘要] 新英雄传奇的主题话语是一种多维性的意义结构。从知识与权力的关系看, 新英雄传奇是一种“拥有本身话语类型的叙事陈述”, 积极参与了当代社会的新型意识形态建构。它不仅展开了对新中国国家政权历史合法性的具象“论证”, 构建了革命历史的元话语, 而且以新英雄人物形象等载体, 建构了革命者的人生价值体系, 为民众提供了生活的价值范型, 并以叙事的形式演绎了种种革命理念, 由此成为一种独特的意识形态话语。

[关键词] 新英雄传奇; 新型意识形态; 建构

[中图分类号] I 206.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881X(2003)02-0236-06

在当代革命历史小说中, 新英雄传奇以新英雄人物为纽带, 以传奇为审美旨趣, 书写中国新民主主义战争或斗争的历史, 与当代现实主义战争小说一起, 共同组成了革命历史的“经典性”文本。作为历史叙事, 新英雄传奇一方面凸现了历史的基本走向, 构建了现代中华民族自由解放的神话; 另一方面又是“一种拥有本身话语类型的叙事陈述”^[1](第164页)。质言之, 它同时是一种意识形态话语的建构。正如国内学者所说, “在既定意识形态的规限内讲述既定的历史题材, 以达成既定的意识形态目的”^[2](第2页), 构成了包括新英雄传奇在内的当代革命历史小说的写作策略。

一

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特雷·伊格尔顿指出: “文学, 就我们所继承的这一词的含义来说, 就是一种意识形态。它与社会权力问题有着最密切的关系。”^[3](第27页)这一论断无疑是深刻的。因为知识与权力从来都不是各自为政的, 而是一种整体的共谋结构, 正如福柯解释说: “不相应建构一种知识领域就不可能有权力关系, 不同时预设和建构权力关系就不会有任何知识”, 或者“权力关系造就了一种知识体系, 知识则扩大和强化了这种权力的效应”^[4](第29, 32页)。知识, 与其说它是知识, 毋宁说它是与权力相伴相生的话语。而文学作为知识的范畴, 它与权力密不可分。一旦文学为权力服务, 便势必成为意识形态。从人类阶级社会以来的历史看, 文学大都极其投入地扮演了意识形态的角色——通过建构特定阶级与集团的生活理念与价值体系, 来为权力服务。而主流意识形态文学尤其如此。

就新英雄传奇而言, 其意识形态属性是有目共睹的。因为, 在工农兵文学思潮的理论框架内, 包括

新英雄传奇在内的革命文学,一开始就被明确定义为“意识形态的文学”。在民族解放战争时期,它们是参与民族救亡、“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的武器”乃至“文化的军队”^[5](第524, 523页)。而在新中国成立之后的和平建设时期,它们是“对广大人民进行共产主义的人生观与人民民主革命的教育的有力武器之一”^[6](第50页)。对广大新英雄传奇作家来说,新英雄传奇作品不仅是对革命历史与现代民族国家的叙事,同时也是形象“论证”新型国家政权合法性的有力工具、对人民大众尤其是青少年进行革命人生教育或理想教育的“形象的教科书”(杜鹏程语)。比如,在《红岩》的写作中,基于意识形态的目的——对广大民众特别是青少年进行革命传统教育,不仅意识形态部门曾广泛参与,而且作者特意从权威著作(如《毛泽东选集》)中获取意识形态的准确定位,因而近年来国内有学者在论及“《红岩》的写作方式”时指出:“从某种意义上说,《红岩》的作者是一群为着同一意识形态目的而协作的书写者们的组合。”^[7](第113页)

然而,新英雄传奇所建构的并不是一般的意识形态话语。美国现代政治理论家亨廷顿指出:“革命是指一个社会的政治制度、社会结构、领导权、政府活动和政策以及社会的主要价值观和神话,发生迅速的、根本的、暴力的全国性变革。因此,革命不同于起义、反叛、暴动、政变和独立战争。政变本身只改变领导权和政策;叛乱或起义可能会改变政策、领导权和政治制度,但不会改变社会结构和价值观。独立战争是一个社会反对另一个外部社会统治的斗争,它并不一定意味着共同体本身社会结构的改变。”^[8](第258页)新民主主义革命正是如此。它不仅是中国历史一场深刻的政治、经济结构的划时代变革,而且是一场思想文化的历史巨变。以批判资本主义私有制、剥削制度与异化现实,建设社会主义财产制度、分配制度、政治制度,实现终极的共产主义社会为要旨的马克思主义学说,从“五四”时期开始就成为中国共产党的理论武器,成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思想指南,并在新中国成立后上升为国家的意识形态。对新英雄传奇来说,它所建构的实际上就是在马克思主义学说指导下的新型意识形态文化。

二

伊格尔顿指出:意识形态的意义在于“使社会统治阶级的权力合法化”^[9](第9页)。美国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家詹姆斯也说:“一般说来,统治阶级意识形态将探讨使自身权力立场合法化的各种策略。”^[10](第72页)对统治阶级或新兴阶级的意识形态来说,其核心的职能莫过于为权力(即政权)运作构建元话语,亦即通过叙事等形式为权力的合法性提供论证,从而保证权力得以正常运行。自从人类历史上诞生国家(即权力)以来,意识形态一直没有停止过它对权力的效力。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型政权来说,其合法性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历史本身所证明了的。广泛的人民性、革命的历史功勋及其正义性,使它无论是在成长阶段还是执政阶段,都得到了中国广大民众的拥护。然而,政权的合法性这一根本性问题毕竟也不能采取虚无飘渺的形式。相反,它需要以文本形式加以确认才能为民众所完全了解。特别是它是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中成长壮大、通过推翻曾经执政的国民党蒋介石政权而上升为全国政权的,这种政权交替的是非曲直也只有通过对历史本身的观照才能得到明确的结论。作为意识形态的文学,新英雄传奇无疑积极地参与了对新中国政权合法性的“论证”。

基于新旧政权历史交替的客观事实,新英雄传奇对新中国政权合法性的“论证”采取了双重变奏的形式。一方面,它消解国民党蒋介石政权的权威性与合法性,另一方面,它建构或“论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型人民政权的进步性与合法性。

在新英雄传奇中,《吕梁英雄传》可谓开创了“论证”新中国政权合法性的先河。在“起头的話”与第一回里,小说首先便以近乎愤怒的语气揭露了国民党政府及其军队在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局势下消极抗日、损害民族利益及坑害人民的劣行:芦沟桥事变爆发后,处于执政地位的国民党政府“一贯对日屈服,订下了许多卖国条约”,并“专一压迫屠杀人民”。面对日本的大举进攻,国民党政府“丝毫没作抵抗的准备”,其几十万晋绥军“只是乱招架了一阵,便望风而逃”,结果在不到三个月时间里,日寇就打进了

晋绥地区。那些党国大员与军事长官们,卷起平时搜刮的民财逃向西安、重庆等大后方。溃逃的政府军士兵则专门与民众为敌,蛮横地“要白洋,要大烟,要酒肉,要女人”。小说尽管由于意识形态的对立而把抗战初期的国民党政权及其军队过于丑化了,但无疑表明:由于祸国殃民,国民党政权统治中国人民的权威性与合法性已严重丧失了,必为中国人民所唾弃,为革命历史潮流所淘汰。

相比之下,小说描述的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抗日民主新政权却是另外一番样子: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一二〇师1938年“给疯狂的日寇以迎头痛击”,连续收复了宁武、五寨等七个县区。1940年春建立的康家寨“抗日新政权”,一方面实行减租减息政策,使“家家有活路,人人有饭吃”,一方面成立“抗日自卫队”,团结各阶层力量共同抗日。康家寨再次沦陷之后,共产党边区政府随即派马区长、八路军武工队员武得民前来解救苦难,带来了毛主席关于“闹民兵”、“挤敌人”等抗日方针。特别是武得民,他一边暗中领导抗日,一边以货郎身分作掩护,积极为群众排忧解难,待他身分公开后,康家寨受苦群众对他感激不尽,以致出现了“欢欢喜喜认恩人”的动人情景。小说的描写表明:共产党、毛泽东领导的新型人民政权才是真正救国救民、真正代表民族与人民根本利益、并因此赢得民心的政权组织,才是顺应历史潮流、真正体现全民意志、具备正义性与真理性、受到广大人民群众衷心拥戴的政府。尽管这时候它尚未取得执政的地位,其发展的趋势是必将取代丧失合法性的国民党蒋介石政权。

《吕梁英雄传》这种消解国民党政权的合法性与“论证”共产党政权的合法性的话语模式,在后来的新英雄传奇中得到了普遍沿袭。在《新儿女英雄传》中,小说一方面披露了抗战初期河北国民党政权大小官员只顾“携金带银”、“拔锅卷席”地逃跑及军队迅速溃败、“一路抢人劫道”的劣迹,控诉了抗战期间国民党县党部主任何世雄投降日本、出卖民族与国家的罪行;一方面则描绘了中国共产党新政权领导冀中人民抗日、收复冀中“十三座县城”的显著业绩及其深得民心——如小说结尾处秀女儿说:“毛主席领导咱们把鬼子都打败了,咱们跟着他,干什么不能胜利呀!”在《将军河》中,小说既描写了将军河一带国民党军队消极抗日、节节败退却又枪口对内的可恶行径,并指出“蒋介石实行不抵抗的媚敌政策,国民党军队不放一枪一弹地败退”是“嗜杀成性的日本法西斯匪徒,愈加骄横狂妄”的根源;又描写了以周世忠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发动人民打击日寇、收复河山的英雄壮举,描写了人民群众对共产党的信赖——通过义和团老团首古大鹏的口称赞中国共产党及其军队是“解救万民”、让“老百姓坐天下”的“能人”。在《红岩》中,小说不仅通过描绘新中国成立前夕重庆中共地下党人与国民党特务的不屈斗争来展示革命与反革命、正义与非正义的较量,而且还通过国民党老党员、将军黄以声的现身说法——“蒋介石的国民党非垮不可,美国佬,原子弹都救不了他的命。今天看看人家共产党,人家的政策深得民心,人家做的一切,才真正是‘天下为公’!所以人家有无穷的力量,足以解放全国人民,给全国人民以富强康乐的希望”——揭示国民党政权必然垮台的结局与共产党政权必然兴盛的历史逻辑。

三

美国著名哲学、社会科学家伯恩斯指出:“意识形态的主要特点是它把人们信仰什么和人们怎样得到某种信仰结合起来。前者包括人们的信仰体系、价值结构和世界观;后者指人们通过什么样的透镜去看世界,以及人们是基于什么样的思想、经验和动机来选择和评价他们所看到的一系列现象。”^[11](第302页)特雷·伊格尔顿也认为:意识形态“主要指的是那些感觉、评价、认识和信仰模式,它们与社会权力的维持和再生产有某种关系”^[9](第19页)。可见,在意识形态中,由世界观、信仰模式及诸种道德行为规范组成的观念体系——人生价值体系是一项重要的内容,其意义在于为民众提供生活理念与价值规范,引导民众按照权力的运行轨道生活。新中国成立以后,主流意识形态的一个重要任务便是确立广大民众的新型人生价值观念,从而形成他们在“革命所建立的新秩序中的主体意识”^[2](第2页)。新英雄传奇无疑也积极主动地参与了这一思想工程的建设。

首先,新英雄传奇大力建构或张扬了新型的人生价值体系。依据主流意识形态的阐释,所谓新型的

人生价值体系主要就是共产主义人生观与集体英雄主义精神,等等。在新英雄传奇中,体现在新英雄人物身上的新英雄主义精神,实际上也就是这样的人生价值体系。拿《红岩》来讲,书中的英雄人物可以说就是充满共产主义与集体英雄主义精神的群像。对作品中的英雄们而言,共产主义社会是人类历史上迄今为止最美好、最有生命力的社会,献身共产主义的集体伟大事业便是他们人生价值的最大体现。比如江姐,这位坚定的女革命者,不仅在见到丈夫的人头后强抑悲愤,时刻以革命大局为重,而且不幸入狱后用鲜血与生命实践了自己的人生信念——“如果需要为共产主义理想而牺牲,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也可以做到——脸不变色,心不跳”。许云峰、齐晓轩等更是把生的机会留给战友,自己为革命洒尽最后一滴血。正如小说作者所说,《红岩》中的英雄们“都有共产主义的世界观,都有世界革命的崇高理想与必胜信念”、“能把个人生死置之度外,敢于斗争,敢于胜利,乐于为无产阶级革命的伟大事业而献身”^[12](第543页)。通过这批高大乃至完美的英雄群像的塑造,《红岩》令人满意地建构出了一种新型人生价值体系——共产主义的世界观与人生观,写成后旋即被公认为“一部震撼人心的共产主义的教科书”^[13](第99页),进而成为对广大群众特别是青少年进行共产主义理想教育的有效工具。

新英雄传奇中满怀共产主义与集体英雄主义精神的英雄,还有为了祖国为了信仰可以“交出生命”、以“假如幸福必须牺牲别人,就先牺牲自己”为人生准则的剑平、四敏们(《小城春秋》),立誓“要把阶级剥削的根子挖尽,让它永不发芽,要把阶级压迫的种子灭绝,叫它断子绝孙”的孤胆英雄杨子荣(《林海雪原》),始终坚持“一个党员,必须按照党的意图办事”、为革命不怕艰难险阻、勇敢坚贞的杨晓冬(《野火春风斗古城》),勇挑革命重担、英勇不屈、视死如归的年青女区委书记许凤(《战斗的青春》),坚持“永远革命,把人类推向前进!永不休止”的红军大队长郝大成(《万山红遍》)……他们激情满怀的人生誓言与惊天动地的英雄主义行为,共同组成了新型人生价值观念的象征系统。

对于新型意识形态来说,它不仅需要建立自己的思想价值体系,而且需要驳斥与它对立或冲突的思想价值体系。在建构新型人生价值体系的同时,新英雄传奇又通过敌对人物形象与草莽英雄人物形象的塑造批驳或批判了剥削阶级的人生价值体系与旧英雄主义的思想观念。在新英雄传奇中,如果说新英雄人物是新型人生价值体系的载体的话,那么,敌对人物形象就是剥削阶级人生价值观的载体。对敌对人物形象而言,其人生哲学是不为己,天诛地灭,是极端利己主义。如《小城春秋》中的国民党特务赵雄,他鼓吹的人生信条就是“再没有比软心肠更愚蠢的了”,“奴隶性乃人类最高的品德”。因此,他利欲熏心,为了实现个人欲望与野心,卑鄙无耻,不择手段,害死朋友而霸占其妻,整死妻子而谋娶其妹,毒死上司而袭取其职,肆意屠杀革命者而向国民党邀功请赏,可谓天良丧尽,猪狗不如。而《红岩》中,国民党特务徐鹏飞、陆清、黎纪纲们则逆历史潮流而动,阻止人民革命的洪流,坚持成王败寇的人生哲学,为了个人升官发财及个人享乐而与人民为敌,结果是身败名裂,遗臭万年。

新英雄传奇还以草莽英雄为载体,批评了旧英雄主义的思想行为。如《铁道游击队》中的李九是一个武功高强而又具有民族意识的民间英雄,“他勇敢,能干,枪打得准”,对日本鬼子非常仇恨,曾只身偷袭鬼子兵营,一夜打死七个鬼子,不愧为抗日杀敌的好汉。然而,李九存在“光靠他的枪法,不相信别人”、“蛮干”的毛病,他打仗嫌人多累赘,“不相信大家的力量”,认为“自己光杆干多痛快”,结果因特务告密被鬼子包围并残酷地杀害,“落了一个个人蛮干的悲惨下场”。通过李九的故事,作者对个人英雄主义及其危害进行了深刻的批评,并通过刘洪总结李九事件说:“我们要记住这个教训,我们一定要有组织有领导的干。要加强教育,提高队员的政治觉悟。要相信集体和依靠群众。用在山里党经常教育我们的话说:李九是犯了个人英雄主义。”《烈火金刚》中的传奇英雄肖飞智勇双全,但也存在骄傲轻敌,麻痹大意的毛病,所以作者特意在小说描写的最后的战斗中让他“挨了何志武两枪”,以此对他这样的人物加以“警告”^[14](第176页)。

四

苏联文艺理论家波斯彼洛夫说:“意识形态的意义在于,它的内容中包括对于某个发展阶段上的一

定社会制度从思想上加以肯定——对于一定的经济关系制度以及产生于其上的社会——政治关系和法律关系制度从思想上加以肯定和论证;而对于在某一民族生活中妨碍这种制度存在、对它起破坏作用的一切,从思想上加以否定,即对一切与这种制度为敌的东西加以否定。”^[15](第153页)作为异常复杂的多维结构,意识形态的内容并不仅仅局限于“论证”政治权力合法性与建构引导大众生活的人生价值体系,还要以文学形象来演绎革命的种种理念,从而显示革命理论与革命道路的正确性或真理性。

对新英雄传奇代表作家曲波来说,如果说《林海雪原》是一部再现东北剿匪斗争、颇富纪实性的作品的话,那么,《桥隆飙》与《山呼海啸》则分别是假借革命历史的描写来演绎革命理念的作品——《桥隆飙》探讨农民革命的命运,《山呼海啸》“论证”毛泽东军事思想的正确性。不妨以《桥隆飙》为例作一些重点分析。从表层结构上看,《桥隆飙》描写的是一支叫做“‘飙’字军”的农民起义队伍的革命斗争活动,然而作者的深层动机是通过描写中国共产党对“‘飙’字军”的改造,显示这样的革命理念——即该小说的“内容说明”中所提示的“颠扑不破的真理”——“农民的革命斗争,只有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下,才能走向彻底的胜利”:

“‘飙’字军”诞生于山东沿海一带,由当地贫苦农民和渔民自发组成,因不满官府压迫揭竿而起。他们“替天行道”、嫉恶如仇,专为天下穷苦人打抱不平。在三古镇,他们“打鬼子,也打汉奸;打蒋介石的‘正牌军’,也打国民党的‘土司令’;打土豪劣绅,也打地主恶霸;对伪乡长、保长手下无情,对豪商巨富更是绝不放过”(第一章),声势迅猛而又行踪飘忽,往往令对手闻风丧胆却又应对无措,是一支极富民族正义感与民间侠义精神的农民起义队伍。然而作为农民起义队伍,“‘飙’字军”又有着农民阶级先天的局限性,草莽气息极为浓厚。他们杀富济贫,忠于国家,却没有明确的政治目标,行动如同流寇;同情贫苦人民,讲江湖义气,却又缺乏深刻的是非观念,不懂得群众的力量;执行严厉帮规,却组织纪律涣散;反对阶级剥削,却平均主义思想严重;作战勇敢,武功高强,却又表现出个人英雄主义的冒险与卤莽,滋生骄傲自满的情绪……这些局限性又特别集中地存在于“‘飙’字军”首领——桥隆飙的身上。对此,小说通过充满传奇意味的艺术形象进行了描写,一方面展现了这支义军特别是其首领桥隆飙的革命精神,另一方面深刻地暴露了农民革命因阶级局限性而造成的破坏性、盲目性与悲剧性,并直接从负面的角度昭示了“如果没有无产阶级领导,农民的阶级局限性注定了他们革命斗争的失败命运”(第十章)的政治主题。由于中国共产党的诞生,“‘飙’字军”因而避免了以往农民起义所遭致的悲剧性命运。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与“改造”下,他们逐步克服了自身的局限,最终成为了一支具有高度政治觉悟与高度革命纪律、“坚决革命,英勇战斗,扭转乾坤,主宰宇宙”(第二十六章)的真正的革命部队,桥隆飙也由一个草莽农民英雄最终成为一个具有优秀政治品质的革命家。

如果说,《桥隆飙》演绎的是中国农民革命只有接受无产阶级政党领导才有出路这一理念的话,那么《万山红遍》所侧重“论证”的,是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毛泽东所开辟的井冈山革命道路正确性的问题。根据毛泽东大革命失败后对中国革命的总结,由于占全国人口80%以上的中国农民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而农村又是反动统治相对薄弱的环节,因此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必须首先深入广大农村,开辟农村革命根据地,建立工农民主政权,实行土地革命,同时开展武装斗争,逐步消灭反动势力,待革命力量壮大、时机成熟再占领城市,最后夺取全国胜利。简言之,就是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循着这一革命思路,毛泽东创建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开辟了井冈山道路,并把中国革命最终引向了胜利。《万山红遍》着力要表现的正是井冈山革命道路,并通过革命历史的叙事来诠释与“论证”这一革命道路的正确性与真理性。小说虽然没有直接选择毛泽东领导的井冈山革命为描写对象,却通过对一支红军队伍革命活动的描写实现了它的目的。围绕小说的主题,作者展开了形象的描写,运用艺术形象为革命理念作“论证”。如通过描写红军大队长郝大成父辈革命的失败证明中国农民革命离开了先进阶级的领导就“注定不会成功”;通过白马山突围成功的描写说明郝大成率领的、曾经“四处乱窜瞎撞,没有一个明确的目标”工农红军一旦接受了正确的“井冈山道路”,就会逢凶化吉,乃至绝处逢生;通过“崎岖征程”的描写来揭示红军队伍内部的斗争与反映红军战士的成长;通过对投机革命、主张“攻占城市、到处流窜”或“分散隐蔽,流动游击”的特派员黄国信种种活动及其对革命造成的危害的描写来证明

“城市中心论”在中国的行不通和流寇主义与革命的水火不相容，等等。小说通过郝大成的口得出的革命结论就是：“走井冈山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的道路，就是革命的方向。”

[参 考 文 献]

- [1] [美国] 海登·怀特. 作为文学虚构的历史本文[A]. 新历史主义与文学批评[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7.
- [2] 黄子平. “灰阑”中的叙述[M]. 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01.
- [3] [英] 特雷·伊格尔顿. 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M]. 西安: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1986.
- [4] 米歇尔·福柯. 规训与惩罚[M]. 刘北成, 杨远婴译. 北京: 三联书店, 1999.
- [5] 毛泽东.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A]. 毛泽东著作选读: 下册[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6.
- [6] 周扬. 周扬文集: 二[C].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5.
- [7] 洪子诚. 中国当代文学史[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0.
- [8] [美] 塞缪尔·亨廷顿. 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M]. 李盛平, 杨玉生, 等译. 北京: 华夏出版社, 1988.
- [9] 特里·伊格尔顿. 马克思主义与文学批评[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6.
- [10] [美] 弗雷德里克·詹姆斯. 政治无意识[M]. 王逢振, 等译.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9.
- [11] 詹姆斯·麦格雷戈·伯恩斯. 领袖论[A]. 刘李胜, 等译.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6.
- [12] 罗广斌, 杨益言. 创作的过程 学习的过程[A]. 长篇小说研究专集: 中[M]. 济南: 山东大学出版社, 1990.
- [13] 罗 逊, 晓 立. 黎明时刻的一首悲壮史诗——评《红岩》[J]. 文学评论, 1962, (3).
- [14] 刘 流. 《烈火金刚》写作中的几点情况和问题[A]. 创作经验漫谈[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9.
- [15] [苏] 格·尼·波斯彼洛夫. 论美和艺术[M]. 刘宾雁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1.

(责任编辑 何良昊)

Establishment of New Type Ideology

WU Dao-yi

(School of Literature, South-Central University for Ethnic Communities, Wuhan 430074, Hubei, China)

Biography: WU Dao-yi (1965-), male, Doctor, Associate professor, School of Literature, South-Central University for Ethnic Communities, majoring in contemporary Chinese novels.

Abstract: The topic discourse of New Hero Legendary is a meaning structure with poly-dimension. As far a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knowledge and power is concerned, New Hero Legendary is a kind of *narrative presentation with its own discourse type* which participates actively in the establishment of new type ideology of contemporary society. It not only develops concrete *demonstration* of history legality of New-China's state-power, forms the metadiscourse of revolutionary history, but also composes life's merit system of revolutionary by carrier of new hero, which provides mass with merit norm of life, and deducts varieties of revolutionary ideals by taking the form of narrative, therefore it becomes a special ideological discourse.

Key words: new hero legendary; new type ideology; establishment